

如好风来自天外

刘江滨

一醉红粱

周晓枫

是收割高粱的镰刀，是翻动酒糟的铁锹。水，是高粱的植物属性；是烧煮的柴。水，是酿酒的泉；火，是烧起的焰；土，是发酵的泥池泥窖，是蒸煮的云甑和藏储的陶坛。五行聚汇，这是最美妙的化学。其实，茶也是这样，炊饮都是这样。但酒，似乎融汇更多。酒看起来澄澈清透，它汇聚五色：来自高粱籽的红、高粱叶的绿、高粱秆的黄，来自泉水的水晶白，来自窖泥的炭黑。它汇聚五味，既有甜和辣，也有微量且必要的苦和涩，缭绕其间是沉实的香气。

悲欢交集的酒啊，放着是凉的，喝下是热的……把丰富的一切压进酒浆，素不饮酒的我喝下半杯，喉头和胸腔万马奔腾。我明白了，酒就是内心的洪水。童话里有神仙水，现实中有酒，喝下去可身经百战或百变。有人平常寡言，三杯过后，酒力拆除了自设的樊篱，大开户牖，风月入怀，似乎所有相遇的都是亲人。酒，无论甘澈还是绵甜，无论清雅还是凛冽，只要酒杯在手，都可以邀约朋友，或对月独酌，无畏孤独。对善饮者来说，酒是一种日常而美好的梦游。如果说一枕黄粱，是梦醒时分破灭了浪漫主义，那么一醉红粱，就是微醺时刻魔幻的现实主义。

血粒般的高粱，血性般的高粱酒……高粱，既是粮食也是酒；就像文字，既是灵魂的粮食，也是情感的酒浆。其实酿酒与写作的过程，诸多相似。多余的粮食才能酿酒，酒，服务于精神的享乐。在履历与汇报之外，多过基础功用之外的文字表达，才能构成文学。从高粱上打下穗实，酿酒最初取自朴素的粮食；从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，写作的灵感潜伏在看似平淡的柴米油盐与春夏秋冬。进入藏酒洞，浸透空气的沉着酒香，让人不饮自醉。酒坛器形巨大，每坛盛纳的酒液都有2000斤，而这样的巨坛，竟在洞中绵延七公里之远。洞壁和坛体都布满益生菌团，使这里像是神秘而潮湿的肠道系统，这是酿酒的必经过程；就像写作者曾把素材储存在沉默而幽暗的内心，让它们默默酝酿与成长。气候和储存条件，都影响酒的口味和品质；就像即使相同的题材，因为写作者不同的性格、经历和处理，会形成迥异的作品风格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围窖1573的实验室里，用基础酒和调味酒，尝试调制自己偏爱的美酒配方。观察量杯，晃动摇瓶，注射针剂，就此产生千变万化。调制的酒体澄澈，无悬浮和沉淀，在看似透明里，却已蕴藏粮香、窖香、沉香以及难以言说的万物。我们在文学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寻找恰切的名词、动词和形容词，搭配合适的主语、谓语和宾语，调整修正结构、动词结构和联合结构，安排人物、事件、场景和意义，让作品变得新颖、丰富、奇妙甚至复杂，产生意犹未尽的回味。

一瓶酒要经过历练，如同一个人要经过考验。高粱上演着变形记，脱去表层皮壳，经过锤炼、磨砺、蒸煮、幽闭和点睛般的调制，它们从饱满的谷物，变成迷人的酒液。这是象征和隐喻。也许每个人都是一棵岁月里的庄稼，酝酿生命为酒，辛辣而芬芳。让我们能够记忆自己的源头；高粱般的朴素生长；让我们的丰富能够创造自己的远方；酒般的丰富韵味……让我们永不丧失，蕴藏其中，那克制或释放的激情。

小时候对高粱的印象，是糖。混合着淀粉和糖浆的高粱怡，软糯、弹韧、清甜。它和大虾酥一样，都用明黄色的糖纸包裹，用喜庆的红色标识。告别童年的标志之一，是戒糖。好多年没有吃过那种怡糖了，高粱很少在生活中出现。某年在餐厅，看到菜肴配方里有这个名字：蜀黍。我开始没反应过来，想了想，才明白这就是高粱的别称。

2018年的夏天，在四川泸州，我看到漫无际涯的高粱。对我这种五谷不分的人来说，远看没有结穗的高粱，又像芦苇又像甘蔗；直到它结出红褐色、花椒状的籽实，我才绝不会混淆。高粱，像燃烧燎烈的火把，像夏天滚烫的钨丝。这些生长在北纬28度的庄稼，是用来酿酒的糯红高粱。

我平常滴酒不沾。只是偶尔失眠，百方无解，喝一口红酒——也就跟药水瓶那样的量，我就能很快不省人事。我开玩笑说，幸亏房屋面积小，要不然，在厨房里喝酒，走不到卧室的床边。血管里有酒流淌的人才能写诗，酒里裹挟着自由，汹涌向前，最后滴滴汇入内心的大海。像我这种，素来不饮者，只能写点老老实实在的散文，我缺乏自我麻醉、自我放纵、自我解放的本事。

但来泸州收割高粱，我兴致盎然。镰刀的柄尺长，刃是弦月形的。我一割断茎秆，我握住籽穗越来越丰盈沉重。在这块最适合制造蒸馏酒的中国版图上，雨水和汗水滴落，天上的阳光和眼睛里的希望之光闪烁，我们才有这样红色的丰收。江河天成，生生不息；夏收高粱，春酿美酒——所以我们此时收割，是对未来的准备。经过泥窖发酵，经过酒洞洞藏，这些高粱将成为年轻的酒，成为老熟的琼浆。

高粱发酵，是在古老的泥池泥窖里。窖泥取自长江回水弯的五渡溪，那里的泥质黏性强。工艺古老，工具也古老：云盘架、云甑、石缸、冰桶和牛尾巴。它们每年出酒数次，酿造历史距今四百多年，这些器物，经过数千次使用，它们上面叠印着无数劳动者秘密的指纹。酒有五行，金木水土火。金，

想想看，你有多少年没有收到过信件了？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，家书、情书都成了明日黄花，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“洛阳城里见秋风，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”（张籍），这样深厚绵密的情感如今又该如何寄托呢？近几年古诗文勃兴，有媒体开设诸如“见字如晤”等节目（栏目），意在使书信的情影重回人们的视野和情感之中。由此，我最近重读了柯灵先生的“书简”，再一次被旧日美好的情怀深深迷醉。

2001年夏天的一天，我收到文汇出版社寄来的《柯灵文集》六卷本。打开包装，看到一纸短笺，上面大意写道：遵柯灵先生生前嘱，给您寄去一套《柯灵文集》，请妥收。柯灵先生2000年6月19日辞世，文集一年后出版，他未能在有生之年得见，殊为遗憾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先生生前居然把我这个无名小辈放在心上，使在他去世后收到他这一份珍贵的礼物，当时我心潮澎湃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“文集”第六卷是书信集（书简），目录中赫然有一标题——《致刘江滨》！我的心跳一下子有些加快，屏住呼吸，打开107页，里面收录了先生给我的三封信。第一封是这样写的：

江滨同志：
忽奉手教，并拜读《人民日报》大文，如好风来自天外，感刻之余，不胜惶愧。舞文弄墨数十年，得邀方家谬赏，何其幸哉！
大作夙精，深佩才识，我大老了，又苦于尘网难逃，不能埋头文事。《十里洋场》一曝十寒，一年竟未着一字，倘竟能杀青成书，自当呈呈求教。
率此奉报，藉布微忱，并祝新年如意，大笔如椽！
柯灵上
1995年1月8日

1994年12月16日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评论柯灵先生的文章《文字魅力最迷人》，嗣后，从著名学者林非先生那里得到柯灵先生的通讯地址，遂修书一封，并报纸寄至上海的家中。不久，便收到了他的这封手书。此信后来还收入他的散文集《天意怜幽草》“八尺楼小简（之三）”中，不过收信人的名字皆隐去，用“xx同志”代替。我和柯灵先生一共通过几次信，因我当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已不记得了。“书简”中选录了三封，这第三封信应该是最后一封，1998年2月我从那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这原先的颜色去了哪里？看碗里的一点汤汁，汤汁也是绿绿的颜色，只是很淡、很浅。

那么，它们为什么会变颜色？豇豆无言，只好自己去想。

按照母亲的说法，长豇豆最早，长豇豆吃得有点倒胃口时，八寸豇豆就来了，这样一来，红豇豆可以吃几次，黑豇豆也可以吃几次。吃是一种心境，颜色一变，就以为自己天天吃的豇豆也有不一样的豇豆。不过口味的确也有些不同，八寸豇比长豇豆要粗，但是吃口更糯。

所有的豇豆都在一个节气里播种，但哪一天播种，日子是不同的，因此生长、成熟的时间就有先后。所以母亲在菜园里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各建造了一堵压不住的棚架，这堵绿了黄了，那堵黄了绿了，反正菜园就一直绿着。

最小的妹妹劝过母亲，不要搭棚了，让豇豆长在地上吧。母亲听了就来了气，说豇豆就是婴儿，地上爬爬，爬了几天后，就要站起来，不搭棚行吗？继续加固棚架的母亲神情很严肃，乐此不疲。

豇豆吃多了，想着换花样，就想到了吃点秋葵。今年，母亲种了两种秋葵，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绿色的秋葵，一种是除了叶子以外都是紫色的秋葵。紫色的秋葵树长出来的是红的，绿色的长出来的是绿的，两种秋葵放在篮子里，红绿交叠在一起，有点夺目。

放在锅里一蒸，起锅了，吃饭了。往碗里一看，一惊：所有的秋葵是一个颜色——淡淡的、浅浅的、嫩生生的绿色。看着，就觉得绿色最坚强，热炒、水滚、气蒸，就是不变色。

但母亲告诉我，这红黑豇豆老了以后，煮了也不变色的。

八寸豇

高明昌

八寸豇豆，母亲叫它八寸豇，省略了一个字，反正大家都听得懂。

以长度命名的豇豆，第一次听到。长豇豆比八寸豇豆长一倍，也没人叫它十六寸豇豆。

反正不能用颜色来命名——八寸豇绿色的居多，但也有红色的，红得不艳丽；还有黑的，有点青紫。我没有听到母亲说这是红豇豆、这是黑豇豆的，依旧叫着八寸豇。

不管颜色，也不管长度，从豇豆的结结构上看，我发现所有的八寸豇，它们的茎、干、枝、叶的颜色倒是全部绿色的，并没有因为豆的颜色不同而变换颜色，感觉豇豆与豇豆的“树”是分开着生长的。

豇豆秧苗是要往上攀援的，它们喜欢将自己的身体缠在什么上面，缠好后再将自己最嫩、最鲜的枝头伸出来，朝上望去，像是要问天。所以所有的豇豆都需要棚架。我们地里竖插着的棚架比人高出一个头，下面大，上面小，像个三角形，底座宽宽的，很是稳扎。棚架的外围全是绿色，人走过，闻到一股青草的气味，非常浓烈。

绿色的八寸豇炒酥后，绿里带青，基本是原色。

红的黑的豇豆呢？炒了以后，却没有保持本色，都成了绿茵茵的样子，看起来这保持本色不管对谁都很难。

台调到石家庄省报工作，给先生写信禀报了情况，先生回信说：“知已转移工作岗位。都是文化生涯，不算改行。但报馆与课堂不同，前者天地较广，活动余地较多。”由于工种新换，环境陌生，好长时间没有写作，也与柯灵先生未再联系，直到他去世。

中国古代即把书信称作“尺牍”“尺素”“尺简”“云锦”“鱼雁”等等，是散文的一种。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、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、杨惲的《报孙会宗书》等都是其中的名篇，刘勰赞之“志气盘桓，各含珠采；并舒轴乎尺素，抑扬乎寸心。”明代以后，始有书信选集和个人书信集行世。周作人尝谓：“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，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。”称尺牍是“特别有趣味的东西”（《日记与尺牍》）。柯灵在给陈青生所编《“孤岛”作家书信集》作的序中云：“书信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，因为它不但具有重要的感情价值和实用价值，如果文情并茂，还有文学价值；鸿爪留痕，兼有历史价值。”《柯灵文集》“书简”收录最早的一封信是1938年7月15日致“孤岛”作家孔令境，最后一封是2000年2月23日致香港作家梁锡华，离柯灵逝世只有不到4个月。但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的信件。从收信人来看，有巴金、冰心、夏衍、钱锺书、阳翰笙、余光中等文学家，于此，书信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；而更多的是柯灵与一些报刊、出版社编辑、研究专家谈关于文章发表、书籍出版等事宜，以及对一些世事、现象的评鹭月旦，这些书信一鳞半爪地呈现出柯灵写作上的心路历程、思想火花，对于柯灵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。由于书信具有私人性、个人性、更客观、更真实，参考价值更高。当然，书信的实用价值是第一位的，在通讯尚不发达的时候，写信成为说事述情的主要工具。柯灵的书信，多谈文事、

文书、身体状况、日常行状等，从中可以一窥其从改革开放到去世的20余年间的主要人生轨迹。在这些信中，柯灵对朋友们时常提及的、也是读者最关心的，是他晚年长篇小说《上海一百年》的写作。然而，文债如山，尘务似海，加上写作难度太大，即便老人曾一度躲到一个专门的写作室埋头写作，最终也只写了第一部《十里洋场》的第一章在《收获》发表，《上海一百年》成为未竟之作，实为憾事。

既然书信可以公开刊布，那么它的文学性、审美性尤为重要，否则，只宜藏之篋中，秘不示人了。柯灵的“书简”正是在文学性审美性上，大放异彩，如隋侯之珠，和氏之玉，成为现代尺牍之经典精品。这些书信整体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，立体凸现了一个正直、热情、谦逊的主人公形象，简洁凝练的文字中间，跳动着一颗炽热纯净的心灵。他为杂文家周木斋平反，为“与抗战无关论”辩白，为《张爱玲文集》出版居间奔走，并因为稿费问题指斥出版社“比包身工的卖身契还厉害”；他在百忙之中以平实的语言给家乡的小学生写信，鼓励他们好好学习；最让人感动的是，书中收录了柯灵与陆耀琪、蔡彩云夫妇从1979年3月2日至1992年1月3日13年间的通信21封，勾勒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陆耀琪是一名在西安工作的中学教师，在《文学评论》《光明日报》发表过论文，得到柯灵赏识；蔡彩云是苏州农村的赤脚医生，夫妻分居两地。为帮助陆耀琪调回苏州，柯灵四处托人，甚至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求助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终于办成。其间的艰难曲折，令人嗟叹。不仅如此，柯灵还几次给蔡彩云寄书，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，缩小与丈夫的差距。我想，如此关怀备至，自家老人也不过如此吧，陆耀琪夫妇何其幸哉！柯灵虽然是一代文学大师，却非常谦逊、

低调，信件中经常自谦“贱名”、“平生碌碌”，称“涸辙之鲋，不求湖海之大，得西江勺水，欣游幸岁”云云。1985年，柯灵家乡绍兴市斗门镇欲给柯灵修建纪念亭，柯灵闻讯“大吃一惊”，7月26日，他一天给当地有关人士写了两封信，坚决制止此事，“无论如何也不能办，必须坚决打消此意。我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，对家乡尤未丝毫尽力，写点文章，薄有文名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值得如此招摇！我感谢你们的好意，但千万不要陷我于荒谬狂悖之境，千万千万！”先生的大师风范、人格境界，与当下某些名利熏心的人相比，真是云泥立判。

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在其《论尺牍之一瞥》中写道：“写信是人生怡乐之一，澄明朗澈的夏月，在嫩叶薰香的书简下，对净几展名笺，淋漓墨迹纵笔挥毫，是赏心的艺术。……一卷之中，总觉得珠玉灿然、光辉耀耀。”这样的书简允称风雅有致的美文小品。柯灵书信的魅力也正在于此。“久疏问候，虽兼葭苍苍，未尝相忘于江湖。去岁创设帐外，畅游京华，得讯即电北京中国作协探询行踪，期能南来，闻已渡海返浙，为之怅怅。”（致余光中）“《上海一百年》喧传多年，今始下决心开笔，速度之慢，胜于蜗牛。所写为鸦片战争时代，事非亲历，隔阂重重，能否完篇，殊不可必，而一败涂地，则可预卜也。”（致钱锺书、杨绛）“手示奉悉，相片拜收。年来老境日深，步门不出，偶动登楼之兴，遂有识荆之缘。”（致潘旭澜）……柯灵的散文一向以简洁典雅著称，书信的文字更多地融入文言成分，按照余光中的说法，是在文字的风火炉中炼丹，遣词造句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，收放自如，举重若轻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。既延续了古代尺牍小品的流风余韵，也传达了现代作家的心情词采，别具一番审美趣味，读之让人流连忘返，借用心神。借用他的语，端的是如好风来自天外，叫人醒醒然，栩栩然，无任欢欣欣快。

如今，这样可视为美文小品的书信如涧边幽兰、空谷足音，已杳不可寻了。不过，也不必太过悲观。手写的书信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微信、短信、电子邮件依然是“信”，我们何不螺壳里做道场，像柯灵先生那样，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，巧工精酿，使其飘散出雅致醇美的芳香呢？



厦门盛夏

朵拉

结。南洋很平常的三角梅，我们称为九重葛或宝巾花，之前没特别放在心上，有一年重回厦门，听说它是厦门市花，从此对这到处可见、花色缤纷、随地盛开、薄薄花瓣的三角梅产生了爱情。并且在水墨画里拼命地画，越描绘越深爱。你可能会问我原因，但我回答不出来，唯一能说的：有些爱情没有理由。答案也许不令人满意，却是事实。

经过古朴的“泽被甘棠”石门楼，往昔的记忆回来了一些些。两边的对联是“鼓浪巡河功万寿，鹭江车渡证五缘”，不知作者是谁，巧妙地把“鼓浪”屿和“鹭江”嵌在对联里。听说这里以前是郑成功练兵骑马走过的地方，老百姓索性把路称为“小走马路”。我没走上去，仅仅拍张照片，试图把过往的记忆多带一点回来，继续牵着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向前徐行慢走。快到码头时，终于认出来。当年中山路还未定为步行街，路上车子不多，下车后我往往回头走过过去的邮局，现在还是邮局，而且就在原来的位置。岁月不居，时光流逝，邮局仍在！喜悦浮上心头，犹如故人重逢。情不自禁地嚷嚷，那边，邮局再过去

一点，是我来换钱的地方。对数据永远记不住的我，却记得当时100美元可以兑888人民币。但那美元必须完整如新，纸币上不能写字或划线，就连一点点褶皱也不许。

右边的醒目红字，是东南亚华人熟悉并信任的“华侨银行”。1926年曾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的鲁迅，到银行来领薪，职员见他衣着朴素，毫不起眼，不相信是来领400大洋的人（鲁迅先生薪金好高），还打电话到厦门大学查实。鲁迅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一段他的亲身经历。听说他在中山路喝过功夫茶，不知道是哪一家？

华侨银行是1877年在厦门设立的批馆。老朋友洪卜仁老师刚刚赠我主编的精装版《厦门侨批》，里边除了文字还有照片，其中一张由陈亚元先生提供的收据，说明是“1928年厦门华侨银行电汇正收据”。

有人耻笑说相信机缘这回事是迷信，但我是一个绝对相信缘分的人。缘分叫我当年到了厦门大学，经过中山路，无意中见中山公园便半路下车，公园是非逛不可的地方，因为花树一直是我的心爱。意外走进厦门花园，观赏画

作时，心仪画家白磊的作品，后来辗转见到了，白老师画了一幅菊花和一幅小鸟，我带返棧城临摹、学习。二十多年后，我回来开了九场南洋风水墨画个展，展览的名字叫“听香”。

这回到厦门，两天时间造访许多新朋友。不曾见过面的新识友人Y，特别自同安赶过来看我。夏天的厦门空气里有烤箱般的炽热，宛如陌生朋友的热情。Y说你就站在这里，鹭江宾馆正好在你后边，前面是一排盛开得灿烂的火红三角梅。我对着Y的镜头，看见在按手机快门的他一头一脸的汗。

闲逛是旅游最好的方式，更是体验慢生活的一种享受。穿过老街老巷时，Y说我们非吃不可的吴再添小吃就在大同路。三个星期前，小吃店的创始人吴再添刚刚以91岁高龄辞世。厦门著名的小吃“虾面”、“沙茶面”、“芋包”、“油葱粿”、“烧肉粽”等“中华名小吃”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大同路比中山路宁静得多，样貌没那样辉煌亮丽，略显沧桑老迈，似乎被游客遗忘，却有本地居民的闲适幽情。游客寻找的网红店，大多位于中山路，不过，凡是老厦门要吃小吃，则非吴再添不可——本地人Y这么告诉我。

一走进吴再添小吃店，我知道我来过。那是厦门大学的求学岁月，一切从一碗沙茶面又回到了从前。我在厦大求学的时候是秋天，这一次回来是厦门盛夏，因为朋友的亲切热诚，一切旧时光历历在目。

行走在盛夏的厦门，让我回到最初的厦门记忆之中。